

于 尔 根 · 奥 斯 特 哈 默 作 品

中国革命

D I E C H I N E S I S C H E R E V O L U T I O N

1925 年

5 月 MAI

30 日

上海 SHANGHAI

中国
革命

Shanghai, 30. Mai 1925.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Jürgen Osterhammel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强朝晖 译

中国革命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1925年 5月 MAI 30日 上海 SHANGHAI

Shanghai, 30. Mai 1925.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Jürgen Osterhammel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强朝晖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 / (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强朝晖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8

书名原文：Shanghai, 30. Mai 1925.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ISBN 978-7-5201-0853-9

I. ①中… II. ①于… ②强…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研究-1925 IV. ①K26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6661 号

中国革命：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

著 者 / [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Jürgen Osterhammel)
译 者 / 强朝晖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 / 周方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 (010) 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11 插页：0.375 字 数：197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8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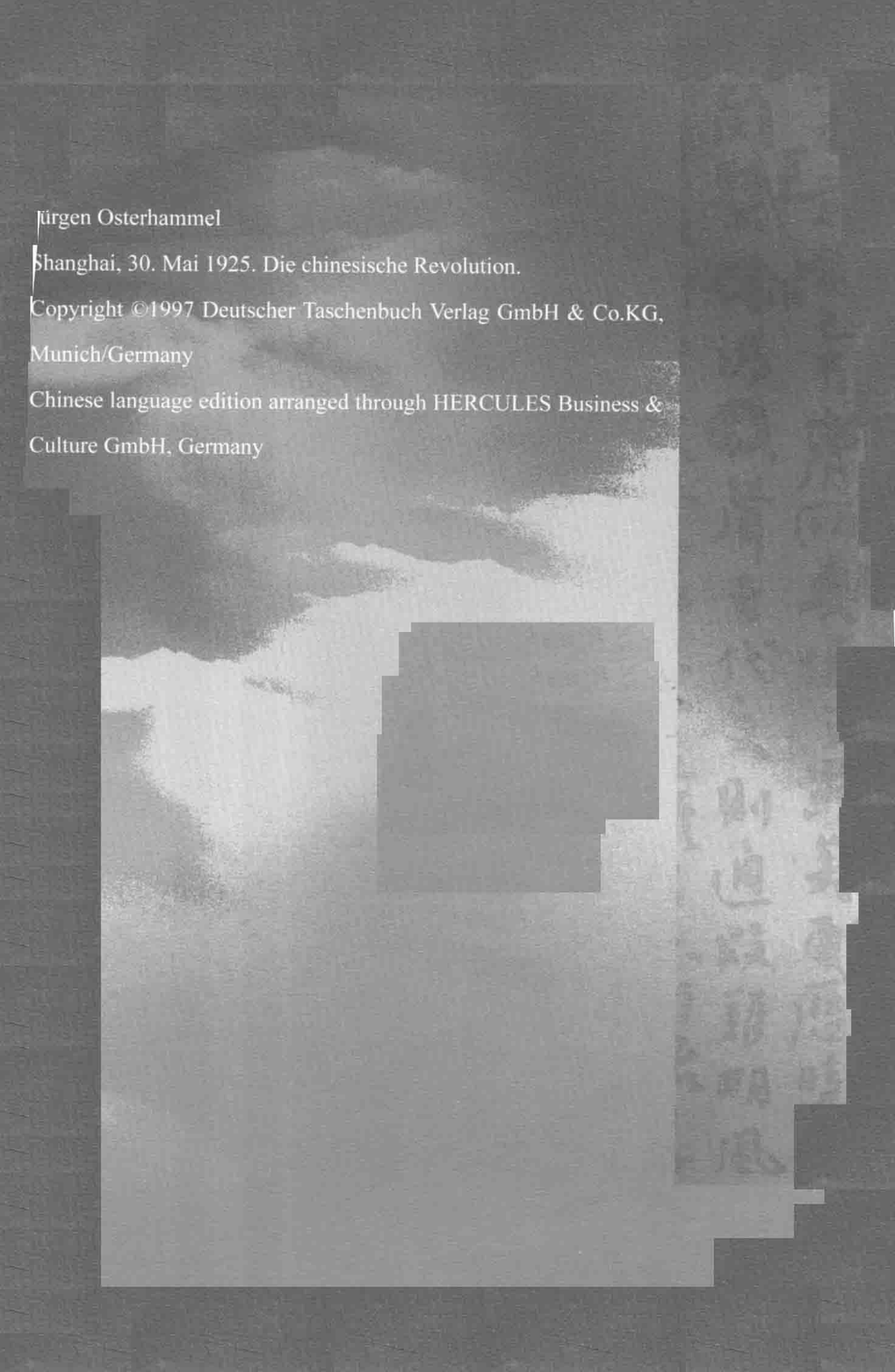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4-8305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Jürgen Osterhammel

Shanghai, 30. Mai 1925.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Copyright ©1997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 Co.KG,

Munich/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出版说明

《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是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早期的一部史学著作，它从五卅运动着眼，通过对历史的简要阐述，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必然性，对其国内的、国际的、对手的、自身的因素均有分析。

本书逻辑严谨、论述周密，是一部难得的关于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著作。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某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比如他对辛亥革命领导者孙中山的历史评价。为了让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奥斯特哈默的观点，我们对相关内容不做删减，也请读者在阅读时予以甄别。

以上种种，敬请读者了解。我们期盼读者的批评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6月

中文版序

本书的德文版最早是于 1997 年出版的。我很高兴看到，在时隔 20 年之后，它能有幸与中国读者见面。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大家在这里看到的是未经修订的原版。我本应通过注释，对书中许多内容加以修正。此外，在本书与我今天从事的工作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相通之处。本书出版后，我的研究方向从中国史转向了全球史。在全球史领域，中国扮演着重要，但并非核心的角色。了解拙著《世界的演变：19 世纪史》——一部有关“长 19 世纪”的世界史——的读者想必会懂得，身为全球史学家，我所探寻并尝试论证的宏大关联是怎样的含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是一个历史文本，它代表了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特殊视角。该视角如今虽已变得较为罕见，但仍然值得人们予以关注。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社会学视角。这一点在书中并不十分醒目，因为本书

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

是从对历史上的一天——1925年5月30日——的叙述开始的。其缘由如下：本书是《20世纪的20天》系列丛书中的一部。其编纂者的初衷是，通过对这些特定历史日子的描述，对20世纪史的重要脉络加以梳理。当人们问到我，应当选择哪一天作为立足点来观察1949年前的中国史时，我首先想到的是1919年5月4日。但后来我觉得，选择1925年5月30日这一天或许更合适。

这是中国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开始的日子。然而它并非本书的核心主题，而只是后续阐述的一段序曲。本书以叙事作为开篇，后面的六个章节则以分析作为重点。在这方面，本书沿循了西方研究中国社会与政治问题的一项悠久传统。该传统早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时就开始了，它在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著作《中国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1931年出版）中得以延续，此后又在以毕仰高（Lucien Bianco）《中国革命的起源 1915 - 1949》（*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1915 - 1949*, 1967年出版，英译本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 - 1949* 出版于1984年）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得到了发扬。所有这些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并不是讲述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将关注点集中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上，例如宗教、农业、官僚体制、军事主义等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书是从一个论点出发展开论述的，该论点迄今在中国和外国仍然经常被讨论，而且并非每一位读者都毫无异议地对其表示认同。它建立在一条假设之上，即论述从19世纪末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的最佳方法，是将革命与现代化的矛盾关系作为着眼点。我的另一条假设是：在这一时期，“革命”是相对更为重要的因素。早在1958年，我的汉语尊师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在其著作《中国革命的百年》（*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英译本 *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于1970年出版）中便以经典方式对这种观点做出了阐述。“革命”在中国并不简单意味着推翻旧的政治制度：先是1911年的清王朝，然后是1948/49年的国民党统治。“革命”更多是对一系列历史进程的概括性定义，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各个领域，人们都可以观察到这些进程的发展。

但是，这些进程所呈现出的特点是不规律和非对称的。因此，我一直在努力尝试在中国各个地域之间做出划分，并尽可能详细地说明，文中涉及的究竟是中国社会的哪些阶级和阶层。思想同样是革命这一宏大进程的组成部分，为此我特意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论述“中国政治的愿景与纲领”。在我眼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章节。特别是在这一章中，我尝试通过与欧洲民族主义的比较，

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

来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性。我认为，这种做法在今天仍然是有益的。书中的阐述主要是针对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因此乍看上去，这些分析似乎已不再有意义。但是，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是对中国的整体历史思维具有塑造性影响的一个时期，在其他许多国家亦是如此。当时形成的一些基础性理念直到 20 世纪末仍然对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

衷心感谢出版社促成了本书在中国的出版。特别感谢强朝晖女士，她凭借深厚的德文功底翻译了我的三卷本《世界的演变：19 世纪史》，然后又翻译了本书。在我的书中不乏艰涩之处，这给翻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2017 年 5 月

目 录

上海，1925 年 5 月 30 日 / 1

城 市 / 1

五卅事件及其后果 / 7

第一章 中国革命的前提条件 / 21

革命—国家的瓦解—现代化 / 21

农业帝国 / 33

农业帝国的终结 / 48

第二章 现代化初期的城市氛围 / 63

资产阶级与经济发展 / 67

从官僚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 85

社会底层与地下帮派组织 / 96

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

第三章	中国政治愿景与纲领	/	112
	启 蒙	/	118
	民族主义	/	127
	三民主义	/	135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	141
第四章	政治乱局与扩张型政府	/	151
	军事主义	/	154
	官僚体系	/	169
第五章	农民与农村社会	/	183
	劳动与所有制	/	187
	商品化与经济停滞	/	201
	不稳定性与灾害	/	206
第六章	共产主义动员阶段	/	216
	实验与失败：1922年至1936年	/	220
	抵抗与扩张：1937年至1945年	/	238
	农村革命与军事占领：1946年至1949年	/	259
注 释	/	272	
缩略语	/	320	
参考文献	/	322	
索 引	/	326	

上海，1925年5月30日

“1925年5月30日将成为远东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7
犹如欧洲的巴士底狱事件一般。”¹写下这段话的作者所表现
出的远见，在英国外交部官员当中是罕有的。事实证明了他
的判断。五卅事件开启了从1925年至1927年这段风云
跌宕的历史，中国史学界称之为“大革命”：在逐渐倒向共
产主义的激进派学生的领导下，群众性示威活动在城市中
展开。其激情澎湃的程度，唯有4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
堪与之相比。在1925年5月30日这一天，中国革命从无序
的泄愤转入了有目标、有组织之行动的阶段。

城 市

这起事件的发生地是上海，在其中扮演巴士底狱角色
的是上海公共租界里戒备森严的老闸捕房。引发示威者怒
火的，并非是古老腐朽的帝制政权，而是以固有形态登场

的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上海人口由 1850 年前后的 50 万增长到 250 多万，相当于原来的 5 倍，并以此成为中国遥遥领先的第一大城市。与此同时，上海也变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业寡头在政治上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 8 与 1842 年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不同，上海从来没有成为正式的殖民地，但是事实上，它很早便落入了外国人的掌控之下。²上海是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鸦片战争（1839 ~ 1842）失败后，外国人可以在这里享受条约规定的特权，其中包括自由贸易权和司法豁免权，即所谓“治外法权”。上海作为远洋港口，其位置靠近中国第一大通航河流长江的入海口，是通往辽阔富饶、人口众多的内陆腹地的一座门户。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上海很快便显现出其他通商口岸无法比拟的优势。³贸易与航运一向是上海繁荣的基础，从 1919 年到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前，上海贸易和航运的发展达到了高峰。⁴此外，自 19 世纪末起，外国银行和企业大规模涌入上海。尽管中国本土企业家也成功参与了上海的工业化，然而在 20 年代中期，大型生产企业却主要掌握在英国人和日本人的手中。近半数产业工人受雇于外国雇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32 家日本棉纱厂。纺纱是上海的第一大产业，日本纱厂的生产

上海，1925年5月30日

能力占总产能的 52%，在这些厂里工作的男女工人和童工超过了 6 万人。⁵

宽阔的林荫大道、鳞次栉比的商店、后殖民风格的华丽建筑与完善的基础设施，使这座城市展现出一副西方现代大都市的风貌。但是，生活在这里的非华人居民实际却仅占少数，并且几乎全部集中在毗邻黄浦江的两处外国飞地。1925 年的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公共租界（官方名称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居住着约 3 万名外国人和 81 万名华人，法租界的外国人和华人数量分别为 8000 和 28.9 万。⁶上海 40% 的居民生活在外国的管辖之下。即使在两处飞地，外国居民的比例也不足 3.5%。其中人数最 9 多的，是政治上没有太大影响力的日本和俄国侨民。而经济和政治的重心，则是由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大约 8000 名英国人所占据。在公共租界拥有选举权的公民群体中，英国人同样也占多数：约 2700 位“纳税人”（ratepayers）凭借其拥有的大片地产，获得了推选由 9 人组成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SMC）的选民资格。⁷工部局是主管上海中心城区的最高行政当局，在其下设的由近千名洋人组成的总办处中，大部分也是英国人。在邻近的法租界里，法国总领事享有处理和掌管租界内近乎一切事务的权力。而相形之下，公共租界的外国政府代表并不具备正式的全权职能，尽管英国总领事作为最

大军事保护国的代表，在上海政治中自然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由以英国人为主的商业精英组成的上海工部局董事会无须对任何上级机构负责，无论是大英帝国首都的殖民部还是议会，中华民国政府自然更无须一提。

上海公共租界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帝国中的帝国”。由外国财阀主导的上海工部局自行制定和颁布各种法规，有自己的警察，可以肆意征税，并且设立了自己的法庭——会审公廨（Mixed Court）。自1911年起，外国法官和律师参与会审公廨的所有诉讼审理，其中也包括华人之间的官司。⁸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单薄的法律依据和模棱两可的妥协作为基础，这些妥协是清廷自1845年之后在外国的胁迫和讨价还价下做出的。中国对全上海的主权从来没有在纸面上被解除。没有哪一部“不公平”的国际法条约规定了公共租界的割让，外国在上海的领地仅仅是以私法的土地世袭租赁权作为保障，而中国政府仍然是名义上的主权人。⁹由于中方只收取微不足道的租金，因此，1880年前后的房地产价格暴涨并没能使中国财政获得任何形式的收益。

10 1854年成立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列强为靠山，利用中国当局的软弱，不断地扩大自身特权，扩张租界的地盘。1899年，租界的规模达到了顶峰。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型体制，即准殖民资本对城市的统治。与亚

洲和非洲其他地区有责任意识的父权式殖民主义不同的是，上海的准殖民统治较少因顾忌而有所节制。当然，在西方人主持下进行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的确给上海大多数居民带来了益处，它使得租界环境明显优于相邻的旧城区，¹⁰但是这些措施的目的，首先在于提高上海外国侨民的生活质量。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仍然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缺少最基本的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为占人口多数的贫苦民众提供教育机会，仍然是私人慈善业的职责。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尽管这些白皮肤的“上海人”为自己精心打造了一副“天下大同”的形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本地人的种族歧视仍然是司空见惯之事。例如，公共租界内的主要公园在 1890 年至 1928 年明令禁止中国人进入（日本人不受此限！），不过，那块传说中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并未真正存在过。¹¹

不仅是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上海的繁荣，并使其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最重要枢纽和吸引内地移民的磁石，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眼中被视为屈辱的政治地位，同样也对上海的兴旺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自 19 世纪 50 年代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这片在外国军舰保护下管理相对有序的领土，成为数十万难民逃避内地战乱的避风港。在两处外国飞地，人们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法律保障，即无论

- 中国朝廷，还是其倒台后的军阀以及中华民国的革命领袖
- 11 都不懂得尊重的“法治”。因此，上海不仅是有钱人为保护其流动资产不被政府肆意剥夺而投奔的地方，而且也吸引了各种异见人士和自由思想者。尽管没有人能绝对保证他们不被“引渡”给中国当局，但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为激进的文学家和反政府人士提供了自由空间。因此，正是以上海为中心，诞生了中国的现代报刊业和出版业。¹² 公共政治在公共租界里逐渐形成，并进一步向全国扩展。尤其是在 1912 年至 1937 年，上海堪称“中国政治的大舞台”。¹³

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 20 世纪初的中国文化之都，与基督教传教士在教育领域的积极投入是分不开的。大约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方面是对发展农民教徒进展缓慢感到失望，另一方面是受新的传教潮流——由单纯的传播福音转向社会改革与教育——的启发，一些教会团体开始将精力投到大城市的高等教育建设上。尽管上海的教会大学无论在排名还是声誉上都不及美国人在北平创办的燕京大学，但至少有两所大学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全国顶尖学府之列：一个是由新教教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另一个是法租界内由耶稣会（Societas Jesu）创建的震旦大学。学者兼传教士马相伯（1840 ~ 1939，又名马良）曾是 1898 年震旦大学建校时的功臣。1905 年，马相伯在教会势力